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曹子洋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这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组织动员、战略策略、军事斗争等方面的坚强领导。

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1931年9月20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发布一系列文告、宣言，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中国共产党不仅参加并积极推动了各地抗日救亡运动发展，而且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1933年，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936年春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至第11军，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斗。

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再次呼吁，“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放弃“反蒋”口号，提出“逼蒋抗日”方针。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卢沟桥事变发生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强调“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7月9日，人民抗日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9月22日，该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次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标志着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英勇行动，领导和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

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中国人民只有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把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视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和政治保证，并以之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一开始就具有三大鲜明特点：广泛的民族性和复杂性、两个政权两支军队并存、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和共同的政治纲领。全民族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逐渐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11月中旬，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军事摩擦，发展成针对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武装进攻。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提出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并将其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报告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确定了“有理、

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

1939年至1943年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更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抗战局面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坚定不移推动全民族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妥协、分裂、倒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是当之无愧的团结抗战核心。

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方向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旗帜鲜明地提出全民族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持久战和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抗战爆发初期就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提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行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战胜民族敌人所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路线。

为了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驳斥亡国论、速胜论，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和斗志，1938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科学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问题，完整提出了实行持久战的一整套具体的作战方针与原则，明确指出游击战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同志科学预见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将相持阶段视为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同志将以往战争史上通

常作为辅助作战形式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并深入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具体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关于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在广大敌后战场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是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两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对日作战。两个战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而敌后游击战争又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占据主要地位。随着日军战略进攻的深入和国民党军的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抓住战机，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颇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等，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敌后战场的开辟，打乱了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对敌人构成了两面夹击的有利战略态势。到抗战结束时，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已有19块，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敌后战场不仅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而且在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80年过去了，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将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目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重要桥梁，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和市场环境，加速技术验证和迭代，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场景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通过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企业能够围绕特定需求开展“链条式”创新，形成生态化、网络化的协同合作模式。场景创新激发创新活力与市场需求，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持。

场景创新通过模拟或构建真实应用场景，有效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距离，促进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场景创新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搬到实际应用环境中，加速技术验证和迭代，提高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场景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通过开放城市应用场景，企业能够围绕特定需求开展“链条式”创新，形成生态化、网络化的协同合作模式。场景创新激发创新活力与市场需求，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持。

近年来，各地积极运用场景创新手段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积累了不少值得推广的经验 and 实践模式。一是全域场景开发赋能模式。依托场景创新促进中心，系统开发并统筹管理全市域、全领域应用场景，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场景碎片化问题。例如，安徽合肥率先成立全国首个城市场景创新促进中心，致力于打造“全域场景应用创新之城”；四川成都提出“场景营城”理念，借助场景创新促进中心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全流程的应用场景服务。二是特色场景创新驱动模式。结合当地优势产业，打造特色应用场景，实现与本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需求的精准匹配。例如，北京深入挖掘央企、京企应用场景，举办“央企、京企应用场景发布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浙江杭州发挥人工智能产业先发优势，加快推进“杭州AI+”场景开放示范工程，为人工智能企业和创业团队创造更多科技成果落地机会。三是数字平台赋能模式。通过搭建智能平台、产业大脑等基础设施，整合数据资源，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技术落地。例如，深圳福田搭建数智融合平台，汇聚近十年1.2亿条各类政务数据，全方位满足创新领域的复杂数据需求。

当然，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场景创新标准化与规范化不足，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城市对场景清单的理解差异较大，有的城市动辄发布上百个场景清单，碎片化问题突出，且部分场景清单存在跟风现象，导致无法精准对接科技成果转化需求。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跨区域场景创新协作模式，导致跨区域合作往往面临创新要素流动不畅、制度壁垒等问题，影响场景创新的协同效应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场景清单重收集发布、轻跟踪落地，导致科技成果转化在场景应用环节缺乏有效支撑。

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质量已成为影响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我国拥有海量应用场景和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场景创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充分发挥场景创新的牵引作用，必将加速科技成果落地生根。这不仅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选择。可考虑从以下方面着力，进一步释放场景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效能。

一是强化战略统筹，系统化布局场景创新。通过布局未来技术应用场景创新试验区，建设具有产业集聚性和示范作用的超级场景，打造最佳实践案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场景服务数字化平台，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持，包括场景清单发布、能力展示和主体对接等。将应用场景创新纳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创新平台规划，重点支持示范性强、带动性大的项目。

二是深化区域合作，构筑场景创新共同体。完善创新要素共享平台，共建技术转移中心和成果转化基金，为跨区域场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探索建立场景创新共同体，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场景创新协同发展，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为广阔的土壤。加强政策法规的衔接与协调，破除制度障碍，建立统一执法标准，全面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整体效能，推动跨区域场景创新合作向纵深发展。

三是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全流程跟踪。完善场景清单管理机制，建立动态跟踪评估体系，对场景项目从发布到落地进行全流程跟踪，确保供需对接后服务保障及时跟进。优化考核指标，避免单纯以场景发布数量为导向，注重场景项目的落地转化率和实际效益。鼓励各地通过“揭榜挂帅”、场景大赛等形式，推动场景供需双方深度合作，强化政策、资金支持，打造场景创新示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大学商学院院长）

本版编辑 秦悦美 编 倪梦婷
来稿邮箱 jjrbl@sina.com

青年学人

人形机器人带来工业发展新机遇

邓 洲

人形机器人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近年来，机器拟人多条技术路线得到突破和实际应用，不少企业推出技术相对成熟且价格较低的机器人产品，使得人形机器人走进大众视野。4月份在北京举办的全球首场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更是进一步推高人形机器人的热度。在机器人应用较为普遍的工业领域，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能否进一步改造升级工业，促成产业的又一次变革？

相较传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有突出的特征和优势，在机械构造、智能化、拟人仿生等技术领域取得显著进步。一是实现了工程机械的突破。人形机器人双足站立奔跑、五指抓取等动作逐渐成熟，推动了传动系统、机械设计、结构设计、运动控制、环境感知等技术发展，使机器人能够在复杂环境中稳定运行和执行多样化任务。二是实现了智力水平的突破。在传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对外部世界的更强感知，能够主动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这使机器人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柔性。三是实现了拟人仿生的突破。人形机器人的外形设计具有更强的亲近感，与人的交互更加简便，使用者不需要专门学习，就可以通过人类语言向机器人下达指令，这使得机器人能够进行更多非专业化应用领域。

尽管人形机器人发展迅速，但目前应用场景主要是展示、引导、陪伴等，多属于服务机器人或专业机器人。相较而言，传统工业机器人发展历史更长，技术专业程度更高，更加追求安全、效率和稳定。其一，工业生产以安全为基本原则，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必须保障工人和工厂安全，这具体表现为工业

机器人工作空间与人类物理隔离，工业机器人的使用需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对机器人参数的修改在未得到授权前是不被允许的。而服务业使用的人形机器人一般不会造成重大人身和财产损害，其操作会更加简单。其二，工业生产强调效率优先，工业机器人会牺牲柔性化、多样化，突出专业化。目前多数工业机器人是针对流水线上某一步骤专门设计的，例如焊接机器人、喷涂机器人、码垛机器人、运输机器人、抓取机器人等。这些机器人的机械设计以完成专业化任务为目的，强化了完成特定工作的力量、速度、精确度等性能，牺牲其他不必要的功能，实现更高生产效率。而人形机器人的拟人化确实能够拓宽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但难以在单一任务上实现高效率和高稳定性。其三，流水线的工业生产模式突出分工基础上的协同，工业机器人注重生产线上的连续性和机器人之间的合作，一般不独立运行。例如，汽车制造流水线上的焊接机器人通常4至6个为一组同时工作，以满足不同焊点的具体要求，节约换装换头的时间。而在服务业和家庭场景中不适合同时使用多台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需具备独立工作能力，但这也可能会损失多台机器人合作带来的高效率。

可见，不同类型机器人有各自擅长的领域，目前人形机器人更适合应用于商业和家庭，在工业生产方面的可靠性和性价比低于传统工业机器人。尽管如此，作为机器人技术、工艺的重要验证平台，人形机器人能够促进机器人动力系统、感知系统、控制系统的进一步优化，其发展理念也会对工业机器人未来发展提供重要启示，这将对工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产生持续影响。

人形机器人能够助推工业生产“人机融合”发展。出于安全考虑，传统工业机器人在运行中是不能被人类接触甚至接近的，而“人机融合”就是通过技术手段破除人与机器的物理障碍，更好发挥两者优势，实现更高效率，完成更复杂工作。2015年前后，各大机器人厂商开始力推可以和人类伙伴同平台工作的协作机器人，并迅速扩大产品线，例如发那科的CR和CRX系列，ABB公司的YuMi、SWIFT1，GoFa系列，安川的HC系列，库卡的LBR iiwa系列，等等。协作机器人与人类共享空间，协同工作完成任务并保证人类的安全，已经在汽车制造、电子信息、金属加工、生物医药等工业行业得到应用，成为工业机器人家族的新成员，进一步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人形机器人本身就具备和人类频繁肢体接触的特征，其传感技术、轨迹运算技术、运动控制技术可以被应用于协作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此外，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共处的理念和逻辑也可对协作机器人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人形机器人可以促进工业数智化改造升级。传统工业机器人按照事先编写的程序进行工作，难以感知外部环境变化，更不能根据环境变化实现自我调整和优化，哪怕很小的问题也必须依靠工程师或技术工人帮助。人形机器人大多具备智能感知和环境适应能力，能够进行自主决策和任务规划，实现多模态融合和交互，甚至进行自主学习和自我优化，这些技术的成熟发展有助于工业机器人智能化升级。目前，已经有一些植入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业机器人在半导体、电子信息、食品、机械加工等零部件较多、较复杂的行业得到应用，机器人能够准确迅速抓取流水线上多样零散的零部件，或

者根据不同加工对象执行差异化程序。例如，智能焊接机器人能够自主识别多品种小批量工件，分析工件的结构和空间关系，并自主执行焊接工艺和机械臂的驱动程序，大大节约了设备调试时间。此外，人形机器人更友好的人机交互方式也可以被工业机器人借鉴。例如，欧姆龙提出一种新的制造理念，机器人能够接受人类语言指令自主生成一套生产流程对零部件进行加工，编程和调试由机器人自行完成，不需要人参与。

人形机器人有助于推动工业机器人可移动化发展。除了用于货物搬运的自动导向车和在有限范围内移动的轨道式机器人，绝大多数传统工业机器人固定不可移动，一点局部的位置调整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验证，这虽然确保了工业大规模制造的安全可靠，但也极大牺牲了柔性，难以满足低成本大规模定制化生产要求。人形机器人有高度自主移动特征，其无线定位、轨迹规划、防碰撞等成熟技术以及可移动的设计理念，可以推动工业机器人的可移动化发展，从而实现未来工厂的柔性化和可重组化。当然，在工业生产中，要实现机器人的自主移动，轮式或履带式要优于人形机器人的双足式。近几年，整合了多关节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人与自动导向车的复合移动机器人得到快速发展，实现了中小型工业机器人的可移动化。

总之，在诸多机器人类型中，工业机器人和人形机器人分属不同技术路线，适用于不同场景，人形机器人虽然短期内不会大规模应用于工厂，但能够提供相关技术和理念，让未来工业生产更加高效、柔性、安全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